

1936年2月下旬,东征红军在中阳县关上村一带全歼阎锡山王牌军——周原健独二旅,打了东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。之后,红军主力挥师南下。3月初,红1军团和红15军团相继开到大麦郊、双池、郭家掌一带集结,在当地开展群众工作。3月5日前后,毛主席在大麦郊一家大院的正中窑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,与周恩来、彭德怀、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及各军团首长研究决定,统一指挥红军主力东进兑九峪,穿过同蒲铁路,开赴抗日前线。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,并亲自部署了兑九峪战斗的作战计划。会后,红军就开始行动。

阎锡山不仅没有从关上、蓬门战斗的惨败中吸取教训,反而变本加厉,继续调动大军阻拦红军东进抗日的去路。2月26日,关上、蓬门战斗的消息传来之后,阎锡山立即召集徐永昌、朱绶光、杨爱源及炮兵司令周岱举行紧急会议,商讨“剿共”办法,当即决定将事先准备的北兵团各部向汾阳、孝义集结。命令杨效欧66师为南翼,进到孝义以南地区;孙楚所部陶振武、孟宪吉两旅为北翼,展开于汾阳三泉镇一带。同时,以李生达代替孙楚任北兵团总指挥,指挥段树华旅进驻汾阳;从水头、石口撤回的霍原壁旅驻于孝义,会同李俊功旅作为正面阻击力量。这样在汾阳、孝义之间就集结了两个纵队共8个旅又2个炮团1个野炮营的兵力。由总指挥杨爱源坐镇孝义,直接指挥,对红军形成包围之势。

同时,又命令留在军汾线上的孙楚所属各旅独立活动于红军后方;方克猷旅协同临县丁炳青旅封锁河防,防堵陕北红军继续东渡,并相机南下柳林、留誉以西地区;马延守旅从吴城南下,向弓阳镇、兑九峪西侧挺进,威胁红军侧背;陈长捷则从柳林经暖泉向关上抄袭红军后路,并相机解除石楼、中阳之围。

与之同时,又加强纵深配备,命原平、忻县之独立第三旅傅存怀等部,进到临县以南,与沿河守军互相联络,加强河防封锁,严防河西红军继续东渡;调大同68师刘覃馥旅于宁武关一线;调平绥线上赵承绶骑兵军主力于山阴、岱岳地区,作为对兴县方面的远翼和后方戒备。

为配合北兵团在吕梁山隘围堵红军,阎锡山又命令南兵团杨澄源69师加强防堵,阻止红军突破同蒲线向南推进。为此,阎锡山特意新编了装甲车大队,每辆车内配备山炮4门、机关枪10余挺,运载步兵日夜巡逻于灵石、霍县的同蒲线上。与此同时,“剿共”总指挥杨爱源于3月1日又亲自飞往前方视察军情。各纵队司令也到达前方。同时,又派出飞机向中阳、石楼一带狂轰滥炸,拼命阻拦红军东进道路。

阎锡山深知晋军并非红军对手,于是一面再次电催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兵援晋;一面不惜出卖民族利益,引狼入室,向日本傀儡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委员长宋哲元表示:“转请日军当局援助。”

早已对山西垂涎已久的蒋介石集团,接到阎氏的求援急电后,正中下怀,即于2月23日下令抽调洛阳、浦口、徐州、潼关等国防要地重兵,北上援晋。3月1日晚,又电令西北“剿共”副司令张学良赴晋视察,督促“剿共”,妄图一举实现其“剿共”、图晋,一箭双雕的计划。

与之同时,日本驻并武官和田也身负秘密使命,于3月1日由并赴平,与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及其他日军首脑,商讨对策,气势汹汹地宣称:“红军渡河节节前进,给华北以直接威胁。日本当局必须予以严重关注,并采取对付办法”。驻平日本武官今井更是露骨地宣称:“彼等希望阎锡山能挫败红军锋芒。不然,则彼敢断言,宋哲元必出兵相助。”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则公然宣称:“如华北当局不能消灭红军,则日方愿尽力协助,以镇压共产党。”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也准备由南京赶赴华北,与日军当局磋商对付红军的办法。

兑九峪大战(上)

以广田弘毅为代表的日本侵华派头目,更是气焰嚣张,乘机活动。3月5日,由西园寺推荐广田组阁,并由天皇于3月6日正式批准,以臭名昭著“广田三原则”作为对华政策的基调,进一步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伐。

在侵华日寇的唆使下,冀察政务委员会头子宋哲元也召集秦德纯、肖振瀛等,商讨防共办法,决定派29军1部赴晋“剿共”。

阎锡山得到蒋介石和日、伪方面的声援后,顿时觉得胆壮了几分。于是在3月2日再次召集杨爱源、徐永昌、朱绶光、王靖国、傅存怀及军委会委员谢廉、张树帜、杨文清举行军事会议,次日发布对红军总攻命令。3月5日又颁布了《查禁共党入晋法》,在沿河各县及邻省边界,指定入晋路口若干处,派员设卡,检查入晋行人;其余路口,一律封锁。

3月6日,阎锡山又下令全省一律戒严,并下令将所有共产党嫌疑犯及同情红军之军民,一律就地枪决。

同日,国民党中央大员、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奉蒋介石指令,由南京飞临太原,与阎锡山共商“剿共”大计。决定首批派遣6师中央大军和部分空军入晋增援。一时间,蒋、阎、日、伪相互配合,狼狈为奸,集中一切反共力量,阻截和围堵抗日红军,妄图扑灭全国的抗日怒火。

遵照阎锡山发布的“总攻”命令和预定的作战方案,3月4日,李生达第2纵队所部首先发起攻击,进占三泉。孝义阎军也于5日向胡家窑、下堡一带进犯,进占下堡。3月6日,第4纵队孙楚所部全线出击;马延守旅由中阳向上桥推进;陈长捷旅由黑龙庙、李家庄进发,占据天神庙、金家庄,进逼留誉镇;方克猷旅由三交镇以东地区沿河前进,占领沙沟、杨家坡等地,配合陈旅进攻留誉,切断红军西去后路;陶振武旅则在万年堡一带向红军进犯,逼近车鸣峪、关上村附近,威胁红侧翼安全。

与北线晋军发动攻击的同时,南兵团第1纵队杨澄源部也密切配合,由隰县向石楼方面进逼,所部428团并于8日夜间进据石口附近之云梦山、山神峪地区,从西、南两面包抄红军。阎军总预备队王靖国部也于3月6日抵达灵石双池镇一带,配合集结在孝义地区的李生达、杨效欧两部布设口袋阵地,准备乘红军东进兑九峪之际,集中兵力,一举“围歼”。

早在3月初,针对阎锡山调集重兵,围攻抗日红军的罪恶阴谋,毛主席在大麦郊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,即全面地分析了当时政治军事形势,及时调整了东进抗日的战略部署,决定集中优势兵力,在兑九峪一带给阎锡山以沉重打击,扫清东进抗日的障碍。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、东征总指挥彭德怀同志、各军团首长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。

大麦郊会议之后,毛主席、彭总指挥即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,亲自部署兑九峪战斗。在给各军团首长下达任务时,毛主席又强调指出:“由于阎军向我逼近,如不打退阎军进攻,我们就无法立足晋西。为开展东征抗日的更大局面,我们必须集中两个军团的力量,给阎锡山一个沉重打击。而后就可以兵分两路,各撒一网,宣传群众,组织群众,扩大红军,筹集物资,为抗日作战准备力量。”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明

确了兑九峪会战的战略意图既不是攻城略地、死打硬拼,也不是消极防御、步步为营。而是要有计划地重创敌军,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,扫清东进抗日的道路,在吕梁山区站稳脚跟,实施分兵发动群众,创立吕梁山根据地的战略意图。

3月8日,作战命令正式下达:红15军团主力75师、78师作为右翼,集结于兑九峪东南的鱼湾、仲家山地区;红1军团主力作为左翼,布防于兑九峪西北的张家庄、碾头村一带,与15军团形成南北夹击之势;1军团红1师及总部特务团布置在兑九峪正面的阳泉曲、柳湾、郭家掌等地,由西向东压逼,配合左、右两翼主力部队围歼兑九峪之敌;15军团81师则由大麦郊、仲家山向东伸延,准备阻击由孝义城而来的增援之敌。与此同时,1军团、15军团各派出部分机动兵力,占据兑九峪阳泉曲附近有利地形,以便切断晋军杨效欧、李生达两部联系,并和左、右两翼的主力互为援应。同时,又以红1师第3团作为左翼支队,活动于碾头西北的南阳、下堡一带,牵制左翼敌军,掩护1军团侧翼安全;另以红2师5团作为右翼支队,活动于汾西、霍县,切断同蒲路,佯攻临汾,迫使晋南之敌——杨澄源所部从隰县、大宁、蒲县等地撤离,退守于临汾城内。从而掩护了15军团的右翼,又直接威胁到介休、孝义之敌的侧后。这样,就以兑九峪镇为中心,伸出了两把强大的“铁钳”,对猬集于兑九峪正面的敌军,形成了一个半月的反包围圈。

由于红军深受群众的爱戴,军事行动消息封锁十分严密。敌军屡次派出小股侦察部队和便衣密探,均被红军捕获。因而敌人一直无法探知红军虚实。为此,阎军总指挥杨爱源十分焦虑,既怕贻误战机难以向阎锡山交帐,又怕轻举冒进,中了埋伏,重蹈关上战斗的覆辙,更怕红军从韩侯岭乘虚北进,包抄后路。真是进退两难,举棋不定。

更为可笑的是这位“剿共”总指挥,虽然身居数万大军严密拱卫的孝义城中,仍觉不够安全,生怕红军队伍从兑九峪长驱东进,奔袭孝义。因此兑九峪战斗前夕,就匆匆忙忙带着戒备森严的随从人员搬到汾阳,将总指挥部设在由基督教会开办的铭义中学。他自己则住到了由外国人开办的汾阳医院。虽然汾阳城距兑九峪前线已有百里之遥,但“总指挥”仍觉不够安全,在进驻汾阳的当天,即命汾阳县长急速派人前往城外砍伐酸枣刺数百斤,务于当日黄昏前把与汾阳医院紧挨的城墙西北角上绑扎停当,以防红军夜间爬墙偷袭。后经承办人员再三解释,说这种东西只能用来防堵偷吃猪羊的野兽,对武装齐备的红军来说无济于事,这位“总指挥”才如梦方醒,立即命令征集大批马灯,当晚要在西、北城墙上每隔一丈安放一盏,以防红军夜袭。

汾阳县长整整忙乱了半天,好不容易勉强交差,谁知第二天早晨,这位“总指挥”大人又传了新的命令:说这个办法仍不合用,马灯吊下去见风就熄,严令想出妥善办法,如有差错,唯县长与差务人员是问。此令一下,把汾阳县长急得满头大汗,召集汾阳界智谋之士及精干吏员开会商讨,绞尽脑汁才想出了个天灯的办法。即:用粗瓷大碗盛上麻油,用棉花搓成灯芯,放在竹框子里吊在城墙外面,麻油火力大,不易被风刮熄,又可照见城下。这样才算交差了事。

深居后方的“总指挥”如此胆虚,驻守前线的官兵更加怕死,你观我望,互相推诿。但迫于阎锡山严令督促,只好胆战心惊冒死前进。

供稿单位:吕梁市委党史研究室
(吕梁市地方志研究室)